

舊上海風雲人物

楊浩●葉覽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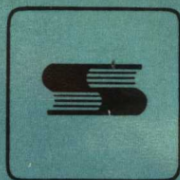
JIU SHANG HAI

FENG YUN REN WU

二集



你想洞悉舊上海的政壇風雲、社會秘聞和幫會黑幕嗎？你想了解舊上海的工商巨擘、紅星名伶和文壇怪杰嗎？你想知道舊上海的歷任市長、愛國英烈和外國名人嗎？本書將在你面前展示出一幅十里洋場的側影。



ISBN 7-208-01242-3/K·293



定价 9.95元

舊上海風雲人物

二集

楊浩 ● 葉覽主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旧上海风云人物》一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发行万册，销售一空。不少读者来电来信，要求重版，要求出版续集。这对编者来说，是十分欣慰的，也是深受鼓舞的。从去年起，我们就根据读者的要求，作了些调查研究，征求了上海史志专家唐振常先生、吴贵芳先生以及中国近代史学者沈渭滨先生的意见，编辑了这本续集。

从1840年到1949年，绵延100多年的近代上海，各界风云人物，究竟有多少？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精确的统计。笼统说来，著名者数百人耳。因为了解上海、研究上海的历史，是同了解、研究这些人物的生平、品格以及理论和实践活动分不开的。所以，继《旧上海风云人物》之后，我们又把这数百人中的革命先驱、志士仁人；工商实业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以及洋人买办、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人物，共63人，分篇作传，连缀成集。其目的就是使读者通过这些人物，进一步了解上海、研究上海的历史；同时，了解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追求和品格，思辨他们的言行，以把握人生的真正价值。

本集在撰写时，作者根据编写的要求，努力做到了：一、写人物的活动，以上海为主。每篇都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取

其在上海的活动，取其在新上海的活动。但考虑到人物的活动整体，对人物在外地的活动，也作扼要的阐述，对人物解放后在上海的活动，则作简历式的概述，力求取舍、详略得当。二、写人兼而叙史，从人物活动的各个侧面，反映了旧上海各个时期的历史片断。撰写中，注意了每个人物的史料搜集，使其都能建筑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并力图遵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人物。篇目按人物出生年月编排，外籍名人传记则列在最后。

参加本集撰写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兴哲、王淦震、冯绍震、田中初、叶露、华强、李蓓蓓、许敏、忻平、邢建榕、后志刚、吕素勤、张乃清、张晓敏、张静星、张毅、张臻、肖吟新、邵雍、沈晓阳、陈祝义、杨申强、杨志勇、郑泽青、周同宝、施中宪、施海根、胡安权、赵人俊、俞莹、奚纪荣、徐有威、徐奕琳、徐海清、崔美明、谢黎萍、傅幸艺、虞建新、颜剑辉。

1991年12月

目 录

洋务干将丁日昌	1
外交活动家伍廷芳	10
抵制美货运动领袖曾铸	17
先施公司创办人黄焕南	25
“六桥老人”胡祖德	32
近代机器造船业先驱朱志尧	38
青帮头目应夔丞	47
“人世楷模”蔡元培	56
“海上三老”之首闻兰亭	68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	76
笔业先驱关伟林	84
投机商人黄楚九	91
首任汉奸市长傅筱庵	100
橡胶大王余芝卿	109
社会救济家朱庆澜	116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	124
南市电车的创办者陆伯鸿	133
小说家包天笑	142
翰林出身的工商实业家陈叔通	148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156
文人企业家陈蝶仙	166
艺术奇才律宗高僧李叔同	173
云间名士陈陶遗	182
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	193
“中国的罗宾汉”王金发	202
“宁波帮”实业家黄廷芳	211
南社才女陆灵素	220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225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235
金融界巨头钱新之	242
诗坛巨星柳亚子	251
“现代弦高”冼冠生	262
《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	271
报界巨子胡政之	278
早期电影导演张石川	285
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李汉俊	294
修辞学的一代宗师陈望道	306
化工巨擘吴蕴初	316
白话文学先驱胡适	325
儿童教育首倡者陈鹤琴	337
爱国戏剧家洪深	346
辞书出版第一人舒新城	354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	362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	370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381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388
漫画大师丰子恺	398
沪上“党皇帝”吴开先	408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416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拓荒者蒋光慈	425
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	436
出卖灵魂的叛徒顾顺章	447
东方大力士查瑞龙	456
文坛骁将李健吾	466
电影艺术家蔡楚生	475
梨园“冬皇”孟小冬	484
社会科学全才李平心	492
“电影皇后”胡蝶	501
现代文学家师陀	512
奇才薄命的女作家萧红	520
越剧名伶筱丹桂	529
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538
扩张租界的急先锋阿礼国	546
美国传教士福开森	554

洋务干将丁日昌

1864年7月，正当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天津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上海的苏淞太道衙门来了一位年逾不惑，雄心勃勃的新道台，他就是被报界称为“深明西学，熟谙洋务”的丁日昌。

重经世，书生入戎幕

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1823年7月7日出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圩一个小康之家。童年时因聪慧过人，被乡人目为神童。13岁丧父，家道衰落，生计艰难。20岁中秀才，赴州试时曾因饥饿昏厥于路旁。早年的贫寒生活，使他了解了民生痛苦。屡次的乡试不第，又使他萌发了蔑视八股，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他在落第后的诗中曾写道：“维云入网尽通材？”“他日安知鸿鹄志。”表达了自己不服气的心情。

1854年，潮州三合会吴忠恕集众围攻潮州城，丁日昌募集三百名乡团助城防，以此军功始入仕途，历任琼州府学训导、江西万安知县、庐陵知县。在知县任上，他致力于安定社会秩序，认真处理讼案并努力发展地方教育，因政绩斐然而见知于赣南道李瀚章。1861年4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克

庐陵，丁日昌因失职罪被革职后流落上海。此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烈火燎原，席卷大半个中国。为了报效清王朝，丁日昌赶到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行轅，上书主张整饬吏治，改革漕政。书中所陈切中时弊，而且治理有方，受到曾国藩的赞赏。丁日昌由此入充戎幕，不久又官复原职。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日后给他许多支持和帮助的上司李鸿章。

办洋务，首创制造局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临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和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内有反抗封建专制和抵制西方势力入侵的人民革命和反抗斗争，处在诸矛盾焦点上的清王朝，既想勾结列强共同来镇压人民革命与反抗，又不甘完全听命于洋人。于是，从统治阶级中就分化出一批洋务派，他们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特别是制造军械的技术，通过“富国强兵”，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早已留心西方富强之技的丁日昌，就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洋务运动的一员干将。

1862年，丁日昌奉调至高州昆崙营督办火器，他招募香港工匠，仿造出西洋炸炮和炮弹，初步显示了他在制造新式武器方面的才能。是年冬天，丁日昌经人介绍，结识了海上名士王韬，这对他以后思想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翌年10月，丁日昌被调到上海主持火器制造。到沪后，他马上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并主持建立了一个完全由中国工匠组成，制造新式小火炮的炮局。该局所造的大炮，在淮军与

太平军的战斗中显示了威力，由此他受到李鸿章的嘉勉。从此，丁日昌在官场步步高升，成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僚属。

1864年6月，丁日昌受命署理苏淞太道。是时，上海虽开埠仅十余年，却已有中外通商之总汇的气象。苏淞太道驻节上海县，不仅要负责治安、财政、刑法，而且还要兼管海关，处理许多涉外事务，可谓事繁职要。丁日昌受命后欣喜异常，觉得这是难得的良机，自己的志向实现有望。到上海就任后，他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中国已面临一个变局，只有顺应潮流，探求自强的方法，取西方之长以利于我，才能抗拒侵略者。为此，他上奏朝廷，主张创办中国自己的新式航运业，一则可为国家培养新式水师以御外患，一则可在商业上与洋人争利。他的建议受到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赞许，于是，李鸿章就把筹建船厂的具体事务交付丁日昌办理。

上海苏州河口入黄浦江处，有一家美商旗记铁厂，是当时洋泾浜外国工厂中规模最大者，能修造轮船和洋枪炮。1864年底，丁日昌以6万余两银的代价，购买了该厂的设备、厂房及库存物资，并留用了原有的工匠。然后又以该厂为基础，并入上海原有的两个炮局，于1865年5月底组建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它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大型军事企业，也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在担任制造局首任总办的近9个月里，丁日昌经过周密调查，为该局制订了经营规划。首先，他主张通过向外国技术人员学习，有目的地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然后逐步达到在技术上不依赖外国，为此还制订了鼓励学习技术的种种办法。其次，明确规定制造局不仅要生产军用设备

和武器，而且还要制造一些民用的机器和轮船，以达到既可以从军事上强兵，又可以从经济上富国的目的。

丁日昌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初期出现的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中之佼佼者。尽管丁日昌与所有洋务派官僚一样，是抱着“中体西用”的宗旨而投身于洋务运动，而且他所创办的制造总局，后来也没能实现他“富国强兵”的初衷。但是，作为中国第一家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该局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护利权，殚心苦周旋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的步步进逼下，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生活在封建社会末世的丁日昌，既感慨于国家利权的逐渐丧失，又痛心于国力的日渐衰微，已无能与列强作强硬的抗争。为此，只能依据中外已签订的条约内容，据理与列强的一些违约和越轨行为进行抗辩，以保住尚未失去的利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运用自己的外交才能和仅有的权限，殚精竭虑地与洋人苦苦周旋，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一些外事纠纷。

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进逼上海，为了“协防”上海，当时的苏淞太道引狼入室，让法国军队进驻了上海县城。但是上海之围解除后，法国军队却赖在城里不走了。丁日昌继任苏淞太道后，认为这是洋人的违约行为。于是，从1864年9月开始，他以条约内容为据，与外国领事进行交涉，并亲自催办。次年5月，终于使外国军队全部撤

出上海城。丁日昌任苏淞太道不久，就发生了外国轮船违约驶入非通商口岸开炮伤人的事件，以及洋商无理要求在上海架设电线、建筑铁路等问题。丁日昌并不反对和平经商，也一贯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到，洋人依仗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破坏条约内容，擅自航行非通商口岸和架电线、铺铁路等举动，是侵我主权，夺我商利的行为，如任其发展，洋人就会得寸进尺，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又以已订立的条约内容为依据，运用自己的职权，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洋人超出条约的无理要求，并且机智、巧妙地处理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棘手的外交和经济事务，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经济和国家权益。

丁日昌办理对外交涉的原则是以条约为准。这固然是出于他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同时也是由于他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很弱，难于同列强作正面的实力对抗，故不可妄启衅端，而只能以条约为原则与洋人周旋，求得暂时的平安无事，以便抓紧时间利用外国的技术奋发图强。在这种为御侮而图强，为图强而暂时屈从侵略者的矛盾心理所产生的按条约办交涉的原则，其用心虽然良苦，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努力犹如螳臂当车，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这不仅是丁日昌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里中国的悲剧。

议海防，禹生呈谋略

1871年，日本以“琉球船民事件”为借口侵入台湾。1874年5月，日军又在台湾南部登陆。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这才

急忙令大臣们筹议整顿海防的切实办法。是时丁日昌因回乡葬母兼养病，已息影林泉近四年。但时刻关心着清政府命运的他，虽身处乡野，却始终忧国忧民。闻讯后，他立即起草了著名的奏章《海防条议》，并附上过去所写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

在《海防条议》中，丁日昌重申了他早在1867年就已提出的建立北、中、南三洋水师的创议，并进一步强调裁汰冗兵，集中资金购买新式军械，精练新兵为当前之要务。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丁日昌认为决不可掉以轻心，中国应着力开发、经营台湾，一则以固东南海防，一则可杜其覬覦台湾之心。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开路矿、办实业、设银行等一系列兴大利的富国主张，并且从经济和战略的长远观点出发，提出以后再设机器局之类的大型工厂企业，应考虑设在原料产地附近，而不能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免一旦发生战事即易被摧毁。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力主不拘一格地选拔、培养、使用能够济世通变的人材。同时又要刻意整饬吏治以保商安民。他列举当时催科、词讼、营汛、榷税、捐输的种种弊端及民生之疾苦，沉痛地指出：“当官幕吃烟饮酒呼卢喝雉之时，正百姓颠连疾苦哀吁无门之时”，而民生不安则将成国家的心腹大患。为了使朝廷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不惜冒着被弹劾、治罪的风险，比较、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批判了顽固派的守旧观点，他说：“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已失矣”。他认为今日中国要御侮自强，必须以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的毅力，学习西方各国的长处，摒弃门户之争，同心协力，兢兢业业地办一些实事，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海防条约》是丁日昌一生政治思想的总结。作为一个洋务派官僚，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虽然未能越过“中体西用”的藩篱，行动中也常常表现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不失为一个具有深远目光的政治家，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富有务实精神和坚韧不拔毅力的实干家。尽管仇视他的顽固派官僚诬他为“丁鬼奴”，骂他心术不正，但是他的卓见远识和论事、办事之精细切实，却是顽固派也难以攻讦的。丁日昌以他的政绩“蒙知于当局，受赞于时人”，成为致力于中国社会近代化实践的先驱者之一。

授巡抚，抱病治台湾

1875年(光绪元年)12月，丁日昌在坚辞不准的情况下被补授福建巡抚。当时台湾尚未设省，仍属闽省管辖。在抚闽近二年的时间里，丁日昌倾心致力于台湾的开发和经营。1876年11月，他不顾沉痾在身，抱病赴台湾，巡视台岛，考察形势与民情，然后开始实践他在《海防条议》中提出的经济政策。他在台湾主持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督办了中国第一个用西洋机器开采的煤矿井；倡议筹划了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建的铁路。尽管这三件事都由于经费难筹和顽固派的阻挠，始建即告夭折，但是却对日后发展台湾经济和海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进一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设备起了

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当时的《申报》评论此事说：“今丁中丞首开煤矿，又筑铁路，其余诸务，均欲改用西法以从事。数年之后，而台湾所得之利，必有可观者矣。”十余年后，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丁日昌经营台湾的事业，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丁日昌一生律己惟谨，御下甚严，且能体时察势，学习并引进西学，以他卓越的观察力和才干，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他毕生致力于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他对清王朝的忠诚，得到了封建统治者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嘉许和褒奖，曾三次奉诏入京，两度蒙恩觐见，并因政绩斐然，而由一名小小知县，迁任苏淞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诸要职，晚年还被加总督衔驻南洋办海防，并令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还多次奉命处理重大的外交事件。曾国藩赞他“精思果力，熟悉洋务”。李鸿章说他“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可见他是得到清王朝的信任和倚重的。丁日昌的洋务活动，在客观上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他搞洋务的主观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注定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终将失败的厄运。

1882年2月27日，丁日昌在广东揭阳郁郁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他还将儿子家人唤至榻前，口授遗折：“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通篇遗折，无一言谈及家事，只留下了一席忠君爱国的肺腑之言。但是他所

效忠的大清朝在他死后，不仅不图自强，反而与列强签订了更多的卖国条约，拱手相送中国的财富和大好河山，最后变成了一个“洋人的朝廷”。18年后，有人提出请斩丁日昌尸，以谢天下。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丁日昌，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肖吟新)